一行三会负责人谈全球视野下的金融业改革与发展

金融业参与竞争和开放才会发展更好

■本报记者 **李静**

2017年，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继续向纵深推进，经济指标呈现改善趋势，经济复苏动力增强。与此同时，国际经济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各国发展均面临诸多不稳定因素。金融业作为现代经济的血液，与实体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互为依托，金融业改革与发展成为世界各国时刻关注的焦点。

昨天举行的陆家嘴论坛上，一行三会负责人围绕论坛主题“全球视野下的金融改革与稳健发展”发表主旨演讲。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论坛共同轮值主席周小川致辞。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王兆星发言。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姜洋发言。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黄洪发言。 均**傅国林**摄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不开放不竞争会纵容低标准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指出，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通过参与竞争，优化资源配置，实现经济社会进步和繁荣，在此过程中，对外开放起了重要作用，“金融行业不是例外，同样适用竞争和开放的规律，由此才会发展得更好。”

在我国，金融业尤其是银行业曾承担资源配置、稳定经济基础等功能，被描述为“国民经济的命脉行业”及现代经济的核心。周小川认为，不管从WTO谈判内容还是中国统计体系对服务业的分类看，金融服务业是竞争性服务业，“服务业有些领域涉及敏感行业，也有一些服务难以跨境提供，市场经济难以全部覆盖，但大多数服务业是可以开放的。”

周小川认为，开放对金融业尤为重要，“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说明，要防范金融危机首先要保证金融机构的健康性，对诸如高杠杆、低资本、不良贷款等现象均不可宽容，而越是不开放、不竞争，往往越会纵容这些低标准。”

周小川说，和最早对外开放的制造业发展路径相似，我国服务业也已通过“引进来”和“走出去”提高了竞争力，推动经营效率和服务质量提升，并带动国内相关的政策改革，“有了竞争机制后，国内企业进步很大，越是开放充分、竞争激烈的行业发展越快。”他举例说，我国引入外资银行最开始是希望引入资本，但实践证明，国内商业银行从竞争中学到很多，在产品演变、市场建设、业务模式、管理经验等方面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后来，国内银行又通过股改上市，提高了经营效率、资产质量、公司治理等。与此同时，外资银行进入也间接促进了国内的改革，其中包括会计准则、监管标准及最近的营改增改革等。

周小川介绍，目前已有很多国内金融机构“走出去”，主动适应国际竞争，在风险管理、定价、反洗钱等方面有实质性变化，比如中国五大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跻身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行列，成为资本充足、经营稳健的市场化经营主体，“这些说明金融服务业是竞争性服务业，受益于对外开放，今后还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

对于市场的不同声音，周小川回应，“当然个别人主张保护金融业，等成长壮大后再开放、再参与国际竞争。经验表明，保护导致懒惰。市场和机构不健康导致市场不稳定，容易产生危机。”他说，回顾国内外改革的历程，要提高认识、坚定信心，坚定不移地走对外开放道路。

中国银监会副主席王兆星：防范风险与推进改革不矛盾

“不能因为一些金融乱象、风险，就动摇和停止金融改革和创新，加强金融监管、治理金融乱象、防范金融风险与深化金融改革、推进金融创新并不矛盾对立，而是辩证统一的。”中国银监会副主席王兆星表示，相对于目前经济健康发展的客观需要，我国的金融改革不是过快，而是相对滞后；金融创新不是过度，而是相对不足。

目前，中国是世界最大资本输入国，也是最大资本输出国之一。王兆星认为，中国经济和金融业已深度融入全球化进程，金融改革开放及发展都须有更宽、更高的全球视野，综合考量国内外各种因素，加强金融改革的顶层设计和科学规划。

他认为，未来的金融改革应包括三方面：一是建立可持续健康发展的金融战略和发展模式，真正发挥银行业金融机构作为防范风险、创新服务支持经济发展的主体作用。二是构建科学有效、具有逆周期、动态调节功能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实现财政、货币、信贷和监管政策的有机协调联动。三是通过深化改革构建完善高效的金融监管体系，努力构建能够最大程度保护存款人权益和最大程度防范道德风险的金融安全网体系，以及对监管者的履职评价和问责体系，各个监管部门应最大限度防止监管真空和重叠。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姜洋：去年来查处案件数量创新高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姜洋表示，中国证监会牢牢把握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加快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为资本市场长期稳定健康发展打基础。截至2017年5月底，我国上市公司达3621家，新三板挂牌公司超过1.1万家；今年前5个月，沪深交易所及新三板交易所股权融资5194亿元，交易所债券市场净融资达6808亿元；期货期权市场的品种体系逐步完善，共有农产品、金属、能源、化工等54个期货期权的品种。

我国资本市场稳步发展的同时也要看到，当前发展的内在基础还不牢靠，股市、债市、期市等风险的关联度明显上升，应将防控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姜洋说，当前全球经济发展形势给资本市场改革发展带来新机遇，也有诸多挑战。“2015年股市异常波动后，我们把稳定市场作为修复和发展的基本前提，目前我国资本市场运行总体平稳，自我修复和调节能力明显增强，各项功能有效发挥，服务市场经济的能力有效增强。”

他介绍，去年以来，中国证监会从各个方面大力推进依法全面从严监管，查处的案件数量创历史新高，今年前5个月已罚款60亿元，超过去年全年，促进了资本市场长期健康稳定发展。中国证监会将继续保持监管定力，改进监管方式，继续引导上市公司、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回归本原，专注主业；切实加强市场法制建设，从制度上解决违法成本偏低、执法手段不足、执法威慑力不足等问题；紧紧依托中国人民银行牵头的监管信息协作机制，加强信息共享和政策共同协调，把握好节奏和力度，避免政策碰头叠加，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中国保监会副主席黄洪：解决保险业问题有赖于深改

“过去40年，保险业每个阶段遇到的挑战和问题，都是用改革和发展来解决的。保险业当前也存在不少突出问题，我认为恰恰是因为改革没到位造成的。”中国保监会副主席黄洪在回顾我国保险业发展历程时感言，中国保险业问题解决和风险防控有赖于继续推进改革，而中国经济的稳健发展、金融改革等也需要强大的保险业做支撑。

黄洪说，目前保险业存在资本不实导致偿付能力失真等问题，与市场准入、退出和资本穿透式监管不到位有关；违法违规运用资金的问题与管住后端的改革没跟上有关；而保险产品存在的缺陷与发展理念的深化改革没跟上有关。因此，要从发展方式、管理机制、保险监管等方面入手，深化改革。

对于市场普遍关注的保险监管改革，黄洪指出，未来将重点在价格监管、资本监管、稽查体制、风险处置和队伍建设等方面加大改革，持续发力，其中包括通过穿透透明监管、严查虚假注资和增资，确保保险公司量力经营；完善稽查系统，提升发现问题和风险的能力，把防控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寻求解决之道

金融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本报记者 **张晓鸣**

今年一季度我国GDP同比增长6.9%，创近6个季度以来的新高；“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取得初步成效。但是，在昨天举行的2017陆家嘴论坛上，与会专家指出，我国经济运行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和挑战，产能过剩和需求结构升级的矛盾突出，必须从供给侧和需求端两方面同时寻求解决之道。

去杠杆不能一窝蜂一刀切

企业杠杆率过高不仅弱化投资的能力，反过来也会加大金融风险。“去杠杆是为了释放无效和低端供给，为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留出新的空间。”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张克秋表示。

去杠杆的关键是要按照结构调整的要求，分类施策。“对于僵尸企业要坚决压缩退出，不折不扣地去杠杆；对于发展前景好、暂时遇到困难的企业，要降低杠杆率水平，帮助脱困发展和转型升级；对于薄弱领域环节，要坚定不移地加大补短板的力度。”张克秋强调，在这个过程中，特别要注意不能一窝蜂。

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李云泽认为，配置过程中要坚持市场化原则，充分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应该充分调动市场主体的积极性来配置资源。要坚决摒弃按照行业一刀切，“好行业中有坏企业，坏行业中也有好企业，关键还是要根据是不是有效供给来配置资源。”

专家指出，金融机构还要把握好一个“稳”字，要守住底线，着眼长远。从当前看，要坚持底线思维，合理把握节奏，防止出现“踩踏式”抽贷。从长期看，要坚持跨周期思维，真正走出扩大投资产能过剩、去产能再投资再过剩的周期性循环。

盘活低效金融资源，提升供给效能

用活各类资金，提升融资的质量与效益，首先要坚持正确的方向，也就是说要保证稀缺的资金投向服务于“三去一降一补”的结构性改革这一目标，避免资金空转、脱实向虚。

“要发挥金融的引领作用，引导实体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参与主体，主动参与、主动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银行副行长张青松表示，要进一步提升绿色产业基金、科技银行、信贷工厂等创新性融资方式和融资模式，提升新增产业获得金融资源支持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推动产业升级与动能转换。

盘活低效金融资源，提升供给效能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一环。张青松认为，应促进不良资产证券化等创新业务的发展。充分利用金融市场的功能，拓宽投资者群体把闲置资金加以盘活、加以腾挪的渠道，增加有效供给。

破解融资贵融资难顽疾

针对民营企业、中小企业普遍反映的在主流金融渠道融资难、融资贵这个顽疾，李云泽指出，融资贵、融资难主要是因为中小企业的风险不容易把控。他认为，解决这个难题需要政府、社会、银行齐抓共管、共同努力。政府有必要搭建一个公共金融信息平台，减少金融企业尤其是商业银行获取相关方面信息的成本。同时，商业银行要扩充信息来源渠道，不但利用原来传统线下的数据，也要利用线上的数据；不但要利用静态的数据，也要利用动态的数据；不但要利用金融的数据，也要利用非金融的数据，从而更好地为中小企业画像，更好地进行精准授信。

对此，中欧-世界银行普惠金融中心主任王君深有同感，“比如说动产抵押制度不够到位，使得金融机构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在放款时没有充分的信息，能够帮助他们降低成本和风险”。上海银行董事长金煜也表示，绝大部分实体经济的最主要融资来源还是金融体系。他建议，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特别要注意同步推进金融改革。

上海探求金融中心与科创中心联动

更多资源投向“0到1”式创新

■本报记者 **唐玮婕**

“创新最有价值的是‘0到1’，但投资往往看重‘1到2’‘2到3’，甚至是希望看到‘3到100’才投钱。”昨天举行的陆家嘴论坛“国际金融中心与科创中心建设的联动发展”主题大会上，上海交通大学信息技术与电气工程研究院院长、上海北斗导航创新研究院院长郁文贤的一番肺腑之言引发不少人的共鸣——上海迫切需要把更多资源投向“0到1”创新的方向上。

没有金融支持的科创是一个贫血的科创，没有科创支撑的金融是一个没有后劲的金融。促进科创中心和金融中心联动发展，无疑是上海科创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一条必由之路。

金融结合科技，要发挥市场作用

“上海要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就应该诞生更多原创力量和新兴产业，需要更多‘0到1’的生动故事。”在郁文贤看来，惟有原创性力量才会引发爆发性、颠覆性的价值生成。当然，从“0到1”的过程确实存在很多风险，“这需要建立起一个有效的机制，确保把投资者的风险降低。”

他同时指出，对于上海来说，要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创造更多的“0到1”，就一定要打造一个生态圈，从政府到科学家、企业、服务机构，实现无缝衔接、共生发展，使各方各得其所、各取所需、互相推动。

针对科技界人士的集体期待，上海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刘绍统表示，金融领域某种程度上是管理风险的，既可以为科创企业提供融资，也可以发现它的价值，同时还可以规范治理，“因此，金融和科技完全可以擦出火花。”

刘绍统还说，科技创新和金融分属两个不同领域，各有各的发展规律。要把金融要素和科创要素有效地结合起来，一定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四大联动机制，产生协同效应

“把金融和科技密切结合起来，上海的条件得天独厚。”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认为，“现在说科技金融，是先用科技全面改造金融，然后用改造了的金融全面服务实体经济，当然特别是要服务科技企业。因此，科技和金融的紧密结合有望成为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新机遇。”

事实上，上海近年来在推动金融和科技融合发展方面进行了一些有益探索。上海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已初步形成“3+1”格局。“3”是科技金融的政策支撑体系、机构服务体系、产品创新体系，“1”是科技园区的融资服务平台。

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主任郑杨指出，“在推进两个中心建设联动时，上海将构建四大联动机制。首先在政策设计中，我们会把双方的特点优势需求结合起来，提高政策协同效应。同时，加强机构之间的联动，深化金融机构和科创企业之间的交流。创新合作的模式，加快构建科技金融服务体系，促进金融资源和科技资源的联合联动，相互提供有益的养分。彼此助力、共同成长。”郑杨表示，上海正在培养一支科技金融的复合型人才队伍，有利于推动两者更好联动。而通过搭建各类信息共享平台，让科创企业和金融机构信息充分交流，有效破解融资过程中信息不对称的难题，增强金融机构加大创新、加大创新投入的信心。

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给中国带来新的机遇

金融创新支持“一带一路”建设

■本报记者 **徐晶卉**

全球经济、金融市场正面临非常大的不确定性。低投资低贸易导致全球经济增长率降低、全球央行有膨胀数倍的资产负债表、低利率大环境下金融机构形成了高风险偏好……多重因素交织下，中国经济如何应对这种不确定性？

昨天举行的陆家嘴论坛“全球金融体系面临的不确定性与对应策略”主题讨论中，与会官员和专家认为，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给中国带来了新的机遇，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能够极大推动全球经济、金融的合作发展和改革，要用金融创新支持“一带一路”建设。

中国已成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

英国经济学家约翰·邓宁有一个投资发展理论：一个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和这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阶段和结构密切相关，人均GDP超过4750美元的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净额开始表现为正值。

运用这个理论观察分析，中国经济的发展动力颇有些启示意义。数据显示，去年中国人均GDP已超过8860美元，中国对外投资进入稳步发展期。2016年对外投资增长了44%，达到1831亿美元，首次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并带动中国产品、装备、技术服务和金融走出去。

交通银行董事长牛锡明认为，当前世界经济、金融面临的挑战很多，不确定因素也很多，这也给中国提供了新的机遇。

中国-中东欧基金董事长、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院长姜建清也持相同观点，他认为，全球经济正行走在缓慢复苏通道上，面对诸多不确定性，解决问题的关键还是要靠发展和改革，全球化过程中产生的问题要靠进一步推进全球化来解决，比如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就能极大推动全球经济、金融的合作发展和改革。

中国金融和产业可以扮好引领者角色

去年11月，中国-中东欧金融控股公司成立，并牵头设立了中东欧基金等市场化基金。 作为中国-中东欧基金董事长，姜建清首次分享了他的实践经验。

他认为，产融结合、创新驱动、金融引领将成为未来区域合作和产业投资的重要支撑，“当前中东欧一些国家开始把眼光转向中国，希望进一步加强和中国产业资本的对接，许多中国金融机构和企业对于投资中东欧也表现出浓厚兴趣，他们完全可以借助中国-中东欧基金这一平台寻找直接投资和产业并购。”

姜建清表示，“中国金融和产业可以扮演好引领者角色。”他透露，中东欧金融公司和中东欧基金致力于通过嫁接全球资本、注入中国动力，提供“投资+投行+商业银行”一体化金融解决方案，目标规模将达到100亿欧元，计划撬动信贷资金500亿欧元。

以金融创新引导投资、防范风险

中国企业走出去支持“一带一路”建设、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入全球化，面对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其风险也相应增大。

“投资全球化、金融全球化、生产全球化，对于很多中国企业来说只有10年、20年的短暂历史，企业缺乏海外投资和管理企业经验，暴露出不少问题。”姜建清指出，比如信息不对称、缺乏有效整合、跨文化冲突、缺乏国际化公司治理理念和管理框架等问题都值得关注。与此同时，中东欧地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产业环境也对投资者提出了诸多挑战。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金融界能做些什么？”牛锡明认为，中国银行业需要深入思考如何既能防范风险，又为“一带一路”建设作出贡献。姜建清认为，中东欧基金在引导投资、防范风险上已摸索到一些金融创新方法，比如：发挥杠杆效应，带动全球资本共同参与中东欧产业投资，牵头安排股权、贷款、债券、租赁、衍生品等综合金融服务，提供多渠道解决方案，最大限度保持风险可控。

论坛茶歇时各国代表互相交谈。 **傅国林**摄